

敕勒川访青城 ——呼和浩特市

大窑人的故乡

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名城，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在数十万年前，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先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作为远古文明奇葩的“大窑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人类历史的帷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从距今 3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河套文化”提前到 5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而有力地证明，呼和浩特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窑文化”遗址是呼和浩特市东郊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东北 33 公里处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方向 30 公里处的榆林乡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经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的长期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大型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山半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石）。这种石头质地坚实，碴口锋利，是打制石器工具的绝好原料。山腰以下则是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古迹显露出来。这里的黄土层形成于五个不同地质年代，经历了从四五十年前到距今一两万年前的漫长岁月，记载着整个旧石器时代极为丰富的历史。

经长期的发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黄土层中出土多达几千件各类石器、石片和动物化石，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有着强烈的北方地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灰烬遗迹和古哺乳动物肿骨鹿化石。据科学测定，这

个肿骨鹿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肿骨鹿相同。肿骨鹿是我国华北中更新世中期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中的主要代表。从而证实，“大窑文化”遗址的时代，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中更新世中期，相当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时期。这就说明，早在那个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世代代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随着岁月流逝，在这块 200 万平方米的遗址上，遗迹琳琅，祖先打凿过的石块，堆积很厚的碎片、石渣漫山遍野，俯拾皆是，使这里成为国内外至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多的石器制造场。1979 年，文化部把这一石器制造场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并确认为目前已知的世界面积最大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所。

围绕大窑村，还发现了水泉村、杨四窑子、李执窑子等几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和托克托县海生不浪、东郊美岱村、哈拉沁沟、二十家、东五十家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样，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古人类在呼和浩特地区劳动生息的状况。

胡服骑射建云中

呼和浩特是内地与北方草原联系的战略要地，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曾发生在这里。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城垣——云中古城，即是赵武灵王兴建的。

夏、商、周朝，荤粥、畀方(舌方)、鬼方、玁狁等游牧民族在呼和浩特地区逐水草而居。春秋、战国时期，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入居这一地区，并屡屡南下攻掠，秦国、魏国、赵国等均颇受其苦。但是农耕民族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传统服装与兵车步卒滞重僵化的战法，在与游牧民族紧服窄袖的精干服饰和锐骑捷利、机动灵活的法较量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公元前 307 年，登基 19 年的赵武灵王发奋图强，锐意革新，毅然冲破守旧派的阻挠，带头着胡服、习骑射、变军制，迅速强盛起来。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遂“北破林胡、楼烦”、“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西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所置云中郡，就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南 42 公里处托克托县古城乡的古城村。这是中原王朝在呼和浩特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行政建制。从此，呼和浩特地区即以“云中”著称。

赵武灵王建云中城，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据史书记载，赵武灵王在阴山南麓、黄河西岸择地造城，因沙土疏散，屡建屡塌。于是祈祷问卜：“昼见群鹤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大光在其下。”赵武灵王大悦，说“这是神灵为我指示的祥光啊！”于是在祥

光所示处筑城，一举成功，遂名之曰“云中”。

现有的古云中城遗址，周长约 8 公里。南墙保存较好，长约 1.9 公里，宽 6.5 米，最高可达 8 米，夯层厚 8~12 厘米。东、西、北三面墙体已圯废。但从断壁残垣，仍可想象云中城当年雄踞塞上的英姿。

长城千古屹塞上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据说美国的宇航员在太空观测地球，人间工程只能看到万里长城。

说起长城，人们就会想起秦始皇，也有不少人以为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就是秦始皇建造的。这是误解。

中国的长城始于战国时期，秦始皇是建万里长城的第一人。此后，汉代、金代、明代均建过万里长城。今天八达岭的长城即是明代修建的。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保存的长城年代最早、朝代最多、跨度最长的地区。从呼和浩特地区的长城，即可见一斑。

呼和浩特地区的长城，始建于赵武灵王时期。史载，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赵长城全长约 1000 公里，在呼和浩特境内的长约 260 公里，尤以卓资县至呼和浩特市东郊约 60 公里的地

段保存较为完好。赵长城在大青山腰或山脚依山就势，蜿蜒穿行，跨山越水，形若蛟龙。赵长城多用夯土或石块叠砌，宽者 5~6 米，残高多为 1~2 米。北魏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对呼和浩特境内的赵长城有生动的记载：“芒干水（今大黑河）又西南经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而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山，有高阪谓之白道岭。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所筑也。”

呼和浩特地区境内的秦长城沿用了赵长城，加以修缮。汉武帝以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了汉长城。为了加强长城的防御功能，又在阴山以北建造了两道平行的长城，并修筑了大量烽台、城障。

金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由游牧民族修筑的防御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万里长城。金长城是一种具有内墙外壕或双墙双壕的特殊形制的古长城，史称“金界壕”、“金边墙”。呼和浩特境内的金长城由东北方向方向进入武川县，南行越大青山，入土默特左旗万家沟，西南行翻越大青山主峰，入包头地界，长达 200 余公里。它是历代长城呼和浩特市境内地势最险、海拔最高的一段。

明代长城自洪武帝朱元璋开始，200 年间 18 次大规模修筑，工程极为浩大。呼和浩特境内的明长城在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与山西省交界的地方，

全长 150 余公里。这段明长城分主边、次边内外两道，沿线设有重要关口十余处，当年驻重兵把守。重要的地段，均以巨大的砖石垒砌，雄伟壮观。在长城沿线还有许多烽台、敌楼、城障、将台、隧道、暗门、水门等等，建筑艺术和军事功能在当时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昭君出塞与胡汉和亲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她们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貌”，即花溪浣纱的西施、和亲匈奴的王昭君、拜月祈愿的貂蝉、醉酒赏花的杨贵妃。若论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王昭君。王昭君胡汉和亲，流传下千古赞颂的佳话。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姊归人（现湖北省兴山县）。本是民间良家女子，被选人汉宫为“待诏”。王昭君天生丽质，品性高洁，不事媚谀。因此“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当时汉王朝与北方匈奴战事频繁，各族人民灾难深重，百姓企盼和平。公元前 3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归附汉朝，第三次南下会见汉元帝，表示“愿媾汉氏以自亲”。王昭君得知，自愿请行出塞，充当和亲使者。

《后汉书·南匈奴传》生动地描述了昭君出宫时的情景：昭君“请掖庭令求行”；“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

奴”。为了纪念这次和亲，这一年元帝把年号改为“竟宁”为和平安宁之意。

昭君到达塞外单于庭后，被封为“宁胡嫫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自此双方友好往来长达 60 年之久。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剑戟旧田里，牛羊绕塞多”。出现这样一个和平繁盛的局面，是符合汉匈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因此，王昭君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景仰。

民间传说，昭君出塞之时，远飞的大雁惊异于昭君的美貌，忘记了飞翔，竟从空中落下，即为王昭君有“落雁”之容的来历。

千百年来，昭君出塞为文人墨客讴歌吟诵的题材，留下了大量诗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作《明妃曲》二首，其一云：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唐代诗人柳中庸（柳宗元的族叔）诗云“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元初名相耶律楚材诗

云“青冢路遥人去少，黑山寒重雁来多”、“玉骨已销青冢底，香魂犹绕黑河滨”均是千古传唱的名句。

上述诗中所言“青冢”，即是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呼清公路 9 公里处西侧，大黑河南岸，蒙古语称为“特木尔乌尔虎”，意为“铁山包”。墓身是一座人工夯筑而成的大土丘，高达 33 米，在一望无际的宽广平原上，显得格外巍峨壮观。

从古到今，民间流传着不少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相传每年“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时候，唯独昭君墓上草色青青，故称之为“青冢”。由于墓周围景色宜人，加之晨曦与晚霞的映照，墓景似乎时有变化，民间有昭君墓“晨如峰，午如钟，夕如堽”，一日三变之说。在一片翠郁青葱的丛林掩映下，远远望去，兀立平原的青冢显出“黛色朦胧，若泼浓墨”的景象，被誉为“青冢拥黛”，为旧时呼和浩特八景之一。

盛乐古城奏华章

距今 1600 多年前，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曾建立了拓跋鲜卑人的第一个国都——盛乐古城。

鲜卑人原生活于兴安岭（大鲜卑山、鲜卑山）地区。汉代向南迁徙，随后向西扩展。公元 3 世纪中

叶，鲜卑族拓跋部在首领力微的统帅下，强盛起来，拥有“控弦士马二十余万”，并迁至上默川平原。号令所至，诸部归服。拓跋力微遂在呼和浩特市南 45 公里的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举行了一次部落酋长祭天大会，并建都盛乐。

西晋建兴三年（315 年）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政权，并以盛乐为北都，以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为南都。东晋咸康四年（338 年）什翼犍即代王位，并于东晋咸康七年（341 年）在盛乐故城南筑盛乐新城。东晋永和二年（346 年）迁都盛乐。呼和浩特地区成为拓跋鲜卑比较稳定的政治中心。什翼犍拥有部众数十万人，统治地区主要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山西省北部。

公元 386 年春正月，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在呼和浩特市南部的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年号为“登国”，定都盛乐。不久又改称魏王。拓跋珪四处征伐，节节胜利，扩疆拓土，征服了许多部落，势力日益强大，成为塞北的强大政权。公元 396 年，拓跋珪建天子旗号，改元“皇始”。随后迁都平城，即皇帝位，改元“天兴”，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大道武帝。

拓跋珪复兴了拓跋部之后，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解散了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组织，使各部牧民不再成为各部大人（酋长）的私属，而是成为北魏国家的属民。从而

消除了各部上层贵族拥众称雄的分裂因素，为拓跋鲜卑从军事奴隶制部落联盟过渡到封建制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拓跋珪在保持游牧经济的同时，鼓励实施，“息众保农”“计口授田”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盛乐地区经济繁荣，呈一时之盛。

盛乐古城，至今遗迹尚存。这座古城，坐落于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上土城子村北。古城南接东西摩天岭群山，北连土默川平原，西南有宝贝河（古称金河）环绕，依山傍水，是连接关内至阴山南北的要冲之地。历代王朝在此驻兵设治，历经沧桑。

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东西约 1550 米，南北约 2250 米，面积达 3.5 平方公里。虽经上千年的风雨侵蚀，古城遗址墙体保存基本完好。墙体用灰黄色夹有细砂的粘土夯筑而成，夯土层厚 15~20 厘米。墙体最低处留存 1.2 米，中段、北段最高处约达 7 米，并设有马面。现今，城内不同区域的轮廓仍依稀可辨。

千古传唱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

这首 1500 多年前的《敕勒歌》古朴自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而又大气雄浑、粗犷劲健，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诗篇。这首诗以凝练朴素的语言、质朴真切的情感，描绘了敕勒川草原（今土默川一带）的苍莽辽阔、水草丰美、牛羊肥壮。诗中的天、地、山、川、牛、羊构成了一幅塞上草原的风景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此，不仅在中华大地千古传唱，也流传到国外，甚至编入日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这首诗所讴歌的敕勒川，就是如今的上默川，当时因敕勒族居住于此而得名敕勒川。据史书记载，敕勒族也称作赤狄、赤勒、铁勒，语言与匈奴语大同小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因其迁徙无定，行居多乘高轮车（与今勒勒车相仿）故此也被称为“高车族”。

公元 429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袭败高车，获高车附降者数十万落（一落即一帐或一户），马、牛、羊百余万，皆徙置漠南，“东至濡源（今滦河河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数年之后，乘高车、逐水草而居的敕勒人畜牧蕃息，“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而且也“渐知粒食”，学会农耕了。敕勒人为当时敕勒川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敕勒人性格豪放 擅长歌舞。据《北史》记载 公元 5 世纪中期“五部高车（敕勒）合聚祭天 众至数

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这是敕勒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祭天祈福伴随文化娱乐活动的盛大聚会，与今天内蒙古草原的“那达慕”大会颇为相似。《敕勒歌》就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首诗以其独有的雄浑壮阔、刚健豪迈的风格，成为我国古代草原诗篇的代表作，并影响到唐代的诗歌风格。金末元初的著名诗人元好问曾盛赞《敕勒歌》云：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铁骑雄兵镇武川

从呼和浩特西北的白道穿越大青山，即可达到武川县。这里南依巍峨连绵的大青山，北面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自古为兵家必争的咽喉之地，这就是著称于史的北魏六镇之一——武川镇。遥想当年，在这里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征战厮杀中，造就了几多英雄豪杰？中国历史上建立隋朝的杨氏家族，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其先祖就是武川镇将出身。

北魏建国之初，在大部分敕勒族、高车族南迁敕勒川之后，北方草原的柔然族（蠕蠕）强大起来，不仅据有敕勒故地，还时常南侵，甚至越白道进攻北魏。为防范柔然，北魏屡次出兵征讨，并在阴山以

北修筑长城，设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派重兵驻守。武川镇地处中心位置，又负有捍卫盛乐都城的使命，地位格外重要。

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拓跋鲜卑东部地区的高门子弟豪杰两千户“徙居武川”，镇守边塞。《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领豪杰镇武川固家焉’”。

镇守武川的边将，或本人即有鲜卑血统，或与鲜卑、敕勒、柔然等草原民族女子通婚，又处于草原环境中，因此，受草原民族的影响较深，剽悍善战、弓马娴熟。同时，通过与内地的联系，他们往往又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眼光。因此，一旦风云变幻条件成熟，他们就会施展抱负，一抒鸿鹄之志。

公元523年至525年，北魏六镇爆发了大规模的镇兵、镇民起义。随后又爆发了“六镇降户”的河北大起义、定州起义、朔州起义。北魏政权被起义埋葬，代之而起的是西魏、东魏。

控制东魏实权的是武川镇军事集团首领宇文泰（鲜卑族人）。宇文泰率领武川镇铁骑雄兵占据关陇、河东地区，实行均田制、建立府兵制，壮大了实力。宇文泰去世后，实权由侄儿宇文护掌握。宇文护设置六位柱国大将军、十二位大将军，分别统领军队。其中，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担任柱国大将军，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担任大将军。

此后，宇文氏取西魏而代之，建立北周。皇族以及勋臣多为武川人。据《北史》记载，北周保定三年即公元 563 年，拜爵隋国公的大司空杨忠率大军出征北齐；“忠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飨将士，席卷二十余城”。衣锦还乡，威风不可一世。

过了 17 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次年，杨忠之子、袭隋国公的杨坚取北周而代之，建立隋朝，统一中国。

37 年后，李虎之孙唐公李渊取代了隋朝，登皇帝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唐朝。

阴山通衢白道行

北魏著名的历史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描绘赵武灵王长城时，曾有“白道城”“白道南谷口”“白道岭”的记载，这就是联结阴山南北的千古通衢——白道。

白道自呼和浩特市西北郊坝口子村入阴山，溯河而上，至武川县出阴山北，自古以来是沟通漠南、漠北草原的“北方丝绸之路”、“皮毛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汉时期，匈奴南下屡次从白道进兵。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 年）大将军卫青两次进攻并大败匈奴，也是从白道穿越阴山进入草原，直达漠北。

公元 6 世纪中叶，突厥族在漠北草原崛起。隋

朝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发兵40万南下,隋文帝出兵反击,在白道大败突厥。次年,突厥发生严重内讧,以阿尔泰山为界,分裂为东、西突厥。加之当时草原旱灾严重,草枯无食,牲畜大量死亡,部众生活无着,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隋朝。经白道内附,驻牧于呼和浩特地区,敕勒川由此也称作“白道川”。

沙钵略可汗逝世后,他的侄子突利可汗率众驻牧于白道川,并先后娶隋朝安义公主、义成公主为妃,隋文帝并封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和林格尔南筑大利城,作为启民可汗的牙帐。隋炀帝北巡时,还专门到大利城抚慰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时期“边塞安宁,部众安居乐业,畜牧业迅速发展”,“人民羊马,遍满山谷”呈现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

唐朝初年,东突厥势力强大,屡次进攻唐王朝统治地区。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派大将李靖、张公瑾等率兵十余万,分六路进击,会师白道川,在白道口大败突厥兵。收附降众十余万,安置在白道川一带。以后,在云中故城(今托克托县古城乡)设立云中都护府,不久改为单于大都护府,统辖漠南各府州安置的突厥部众。唐大历八年(773年),单于大都护府迁到盛乐古城(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

隋、唐时期,对安置的突厥部众十分重视。武则天就曾专门送给突厥谷种4万斛,农器3000件,教

其稼穡 并送铁 4 万斤 杂彩 5 万段 助其发展。

白道川地区的安定，也促进了中原与北方草原的贸易往来，北方丝绸之路兴旺一时。当时蒙古草原越阴山进入中原主要有两条大道，一条是由包头西北的昆都仑沟南下渡黄河，经鄂尔多斯高原进长安的“参天可汗道”；另一条就是由白道南下，经山西赴洛阳的“单于道”。从中原则可以经过这两条道路北上草原，西去中亚、西亚、西欧。在白道南口的坝口子村的古城遗址曾发现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即是白道为北方丝绸占道通衢，联系草原、中原交通和贸易的证明。至宋、辽、元、明、清各朝，白道仍是沟通阴山南北的要道。康熙皇帝第二次御驾亲征噶尔丹，大军就是从白道赴漠北，一举歼灭噶尔丹主力的。

至今我们如沿白道赴山北草原，在蜈蚣坝顶极目远眺，仍可想象当年大军行进中，旌旗如云、刀枪如林，车辚辚、马萧萧，鼓声雷动，扬尘蔽日的威武雄壮情景。

古丰州与白塔

呼和浩特有一个古代的称谓“丰州城”这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政权设立的西南路招讨司的治所，旧址在现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的白塔村西南。

契丹系东胡后裔，鲜卑族的一支，唐代日益强